



從社會運動的角度看 中國非正式經濟的轉型

李傳楷*

從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經濟轉型都一直在吸引全世界的眼球。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轉型經濟，試圖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進行著非常大規模的制度變革。但不同於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譬如前蘇聯國家採取了一步到位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中國係採取一個較為務實的作法，在計畫以外逐漸地成長。中國的領導人嘗試用穩定來換取速度，讓解決方案自然而然地在轉型的演化過程中浮現出來，協助國家來解決一些棘手問題，譬如承包到戶（解決人民公社的改革問題）、雙軌制（解決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鄉鎮企業（解決鄉村工業化的問題）。這種作法為草根實驗、集體行動、乃至於社會運動提供了很大的空間，所以在中國，很多新市場或新產業的崛起通常不是透過國家由上而下的力量在推動，而是地方或群眾由下而上的集體行動。地方以擁抱政治運動的熱情去招商引資，群眾則發揮大躍進精神去煉鋼、造汽車、做手機、種光伏。套句中國著名作家余華（2011）的話說：「其實在三十多年所發生的經濟奇蹟裡，革命並沒有消失，只是脫胎換骨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這種現象在非正式經濟更是普遍。非正式經濟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當中，通常扮演著比較邊緣的角色，提供像移民社群之類的邊緣群體創業、就業、融資等的機會與空間。但在中國，非正式經濟通常扮演著改革開放的急先鋒，譬如1990年代資訊科技產業在中國的崛起，就跟中關村的非正式經濟脫不了關係；近年來電子商務或互聯網產業的蓬勃發展，也是非正式經濟不斷地打擦邊球的結果。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發展非正式經濟，因為相對於計畫經濟來說，市場經

*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濟原本就是屬於計畫之外、非正式的。

儘管如此，因為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要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探討中國非正式經濟的轉型，或是說，要把用來解釋西方社會的社會運動的概念或理論套用到中國社會上，卻會出現許多格格不入或值得商榷的地方。以下就分別對這些問題加以說明，並介紹目前可能的解決辦法。

一、所謂的中國特殊性

幾乎每個做中國研究的學者在選擇理論取徑與形成問題意識時，都會面臨一個困難的抉擇：如果要讓西方學者對你的研究感興趣，最好是把你所研究的案例跟西方某一個流行理論和問題意識連接起來，這樣做只要有足夠的聰明與努力，就可以在西方的學術圈獲得成功；但如果要得到中國學者的認可，就需要用另外一套理論及另外一套的問題意識，而兩者相去甚遠。社會運動也是如此。西方目前主流的社會運動理論主要是美國學者根據 1960 年代之後在美國及西歐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發展起來的，因為逐漸被體制吸納走向制度化，所以強調的是資源動員、政治機會、策略框架等比較操作型的理論，問題也是圍繞著如何走向專業化、如何與利益團體掛勾，以及如何操弄媒體及輿論 (McAdam et al., 1996)。相反的，中國的社會運動基本上都是屬於體制外的行為，也不太有固定的組織，只有比較模糊的意識型態的支持，所以一方面很容易因為過激而轉化成革命，另一方面則因為缺乏延續性而無疾而終。

中國學者趙鼎新 (2007) 曾經用制度化程度、組織程度以及改變現狀的訴求程度這三個維度來分析社會運動。在西方，大多數的社會運動都被制度化，或是部分被制度化了，也都有某種程度的組織，以及某種程度改變現狀的訴求，這種社會運動跟常規政治 (routine politics) 最大的差別只是在於一個是對抗的，另一個則是非對抗的。相反的，在中國，大多數的社會運動都是在體制外，如果組織程度高、改變現狀的訴求程度高，就很容易朝向革命發展；如果缺乏組織，改變現狀程度高的就會變成反叛 (rebellion)，程度低的就只是集體行動或騷亂 (riot)。換言之，西方與中國在社會運動最大的分野就是在於體制內外，西方已經將大多數的社會運動納入體制內，中國則剛好相反。所以西方學者對於社會運動的發展前提已經視為理所當然，對於要如何掌控社會、如何將社會運動納入體制內基本上也已經不會再去討論，而



這些恰巧卻是目前中國最關注的問題。

二、社會運動 vs. 制度興業

所以為了要回答中國真正發生、真正感興趣的問題，目前西方主流的社會運動理論顯然不是很好的選擇。大約十年前，一群加拿大學者提出了制度興業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的概念，所謂制度興業是指：「為了某種有興趣的制度安排，動用資源去創造新制度或轉變既有制度的行動」(Maquire et al., 2004: 657)。這個概念的提出原本是想回應制度學派長久以來的「結構中的行動矛盾」(the paradox of embedded agency)：如果行動者都深陷於既有制度當中，那要如何解釋來自於內部的制度變革？它的主要論點其實蠻簡單的，就是在強調必須同時尊重結構與行動者，也就是說，既要考慮到行動者所處的制度脈絡，也要關注到行動者的所作所為對於制度所產生的影響，但因為它是新的概念，問題意識還沒被西方社會的議題占領，也就是可塑性強，特別適合拿來發展適用於中國的集體行動或社會運動理論。

首先，在中國，制度脈絡本身就是值得關注的課題，因為它變化的速度跟規模都是史無前例的，它本身就是一個移動的標靶，很難鎖定。其次，中國的行動者，尤其是非正式經濟的行動者，也是一個不斷流動的群體，有時候甚至有點朝生暮死的味道。這時制度興業的優勢就突顯出來了，我們可以用「括弧策略」(bracketing strategy)(Langley, 1999: 703)來捕捉這兩個移動標靶，就是當研究結構的時候，把行動者括弧起來、凍結住；同樣地，研究行動者的時候也是如此。以一個非正式經濟很著名的案例——中國手機產業的崛起為例，我們可以按照三種不同行動者出現的先後順序，將制度脈絡分成三個時期，用輪流括弧的方式，一方面看制度脈絡如何制約行動者，另一方面看行動者如何透過集體行動去改變制度，最後再找出其背後的規律。結果發現，不同於西方的非正式經濟會隨著產業發展成熟逐漸消聲匿跡，中國的黑手機或山寨機反而是越到後期越火紅，而這跟中國企業的尋租行為有很大的關係，隨著正式經濟的尋租空間越來越小，尋租的重心便逐漸從正式經濟轉向非正式經濟 (Lee & Hung, 2011)。

三、非正式經濟的制度興業策略

有趣的是，透過制度興業的視角，我們不僅觀察到正式經濟的非正式

化，同時也觀察到非正式經濟的正式化。在中國，正式與非正式、體制內與體制外、廟堂與江湖，經常上演著壓制後反叛、反叛後招安的戲碼。這個戲碼的原型，也是歷史上最常被提到的典故是《水滸傳》：108位英雄好漢因為各式各樣的理由被逼上梁山、落草為寇、逐漸壯大、起義造反、最後接受招安。從廟堂的角度來看，這個過程只是統治者吸納反對勢力、弭平社會動盪的過程；但從江湖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非正式經濟的行動者透過集體行動去獲得正當性、並且累積正當性的過程。

我們曾經用中國的山寨機來分析這個過程 (Lee & Hung, 2014)。同樣地，我們也是採用制度興業的視角，並且將視焦集中在非正式經濟當中的創業者。我們認為這些創業者占據了非正式經濟與正式經濟之間的策略位置，他們能夠超越非正式經濟的疆界去塑造議題、尋求支援、調動資源、甚至推動變革，而這些策略行動不僅僅是在擴張市場、爭取到更多消費者而已；更重要的是在提高社會大眾對於山寨機的接受度，「在某些社會建構的規範、價值、信仰及定義系統之下，認為某個實體的行動是可欲的、適當的、恰如其分的」(Suchman, 1995: 574)。

我們發現，有三種策略行動對於正當性的獲得及累積至為關鍵。第一種是構框 (framing)，意指發展出重新認知事物的詮釋架構。例如將非法手機命名為山寨機就是一個很好的構框策略，它是把非正式經濟的創業者放在《水滸傳》的詮釋架構當中，重新詮釋創業者的所作所為是可欲的、適當的、恰如其分的，一如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詮釋紅衛兵的所作所為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第二種是聚眾 (aggregating)，意指將足夠多的行動者圍繞著共同利益組織起來。中國有句俗語叫「罰不責眾」，意思是說，只要犯錯的人夠多，就不會被處罰了。聚眾也是如此，它除了把餅做大之外，更重要的是聚集足夠多的隊友，讓自己在造反的時候更有底氣，更不怕被一鍋端了。山寨機的賣家與買家群聚深圳的華強北商圈就是一個例子。

第三種是搭橋 (bridging)，意指搭上與外界連結的橋梁，以便獲取必要的關鍵資源，跳脫路徑依賴、被既有框架或資源環境鎖死的死循環。搭橋要搭上的不是一般的連結，而是占據策略位置的結構洞 (structural hole)，它可以幫助深陷在某個系統當中的行動者跨越到另外一個系統，尋找互補性的資源、替代性的解決方案、或是新的可能性。山寨機的很多創新突破，譬如完



整解決方案、雙卡雙待、電視手機都是這樣透過搭橋而來的。

四、結語

我們不難想像，在這三種策略的交互運用之下，很多其他在非正式經濟的行動者都應該能夠一步一步地獲得正當性、累積正當性，一直到某個臨界點，完成到正式經濟的轉移。然而現實卻遠比這個還要複雜得多。

首先，行動者本身的資源跟能力往往決定了他所能到達的高度。中關村的電子一條街之所以能夠成功，有些早期倒買倒賣的板爺（踏著板車載著走私組裝的個人電腦的第一代創業者）甚至成為現在的科技大鱷（譬如聯想的柳傳志），跟他們原本就是北大清華或中科院的科技菁英有很大的關係。相反的，因為出身不佳，去掉了非正式經濟的光環，大多數的山寨機廠商在被招安之後反而泯然於眾人矣。

其次，行動者所處的環境也決定了集體行動所能施展的空間，這個環境包括了地方政府本身、地方政府對於非正式經濟的態度，以及非正式經濟跟當地社會的關係。如果說山寨機出現在北京，我想大概很快就會被鎮壓了；但是在深圳，由於當地政府的務實性格、對於非正式經濟的高度容忍，以及非正式經濟在當地社會盤根糾結的關係，正式經濟與非正式經濟的界線變得非常模糊。所以山寨機出現在深圳，既是偶然，也是必然。而地下金融出現在天高皇帝遠的溫州，也不令人意外。

第三，更重要的是，整個中國經濟的轉型，包括正式經濟與非正式經濟，都受到最高政權的強力制約。我們很難想像，世界上有哪一個政權能夠用這麼少的人（大約3%的共產黨員）統治著這麼龐大的人口基數。也很難想像有哪一個政權會這麼強調控制。所以對於這個政權來說，非正式經濟就像是一個雙面刃，它一方面代表了機會，可以提供源源不絕的經濟活力及制度創意；另一方面卻代表了威脅，一旦擦槍走火就會失控。

中國的學者，譬如趙鼎新（2007），普遍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中國建立起解決社會矛盾的機制，讓社會運動在過激之前得到緩解。我對這個問題沒有預設答案，作為臺灣學者，我想我們的角色就是站在歷史所給予我們的一個特殊的觀察位置，目睹並且記錄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

參考文獻

- 余華 (2011)。《十個詞彙裡的中國》。臺北：麥田出版。
- 趙鼎新 (2007)。《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更新和中國經驗》。臺北：巨流。
- Langley, A. (1999). Strategies for theorizing from process data.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4): 691-710.
- Lee, C.-K., Hung, S.-C. (2011). Against the state: the rise of Chinese Mobile Phon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Conference, San Antonio.
- Lee, C.-K., Hung, S.-C. (2014).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China's Shan-zhai mobile phone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8 (1): 16-36.
- Maguire, S., Hardy, C., Lawrence, T.B. (2004).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fields: HIV/AIDS treatment advocacy in Canad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 (5): 657-679.
- McAdam, D., McCarthy, J. D. Zald, M. D. (1996).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chman, M.C. (1995).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3): 571-610.